

诗 与 思

陈晓兰 编

郁贤皓 李白生平及其诗歌畅谈

项 楚 唐代的白话诗派

钱理群 鲁迅散文漫谈

曾繁仁 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

王先霭 宗法思想与中国叙事艺术特点

陆建德 『金钱说了算』 (Money Talks)

学林出版社

诗 与 思

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录

陈晓兰 编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与思：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录/ 陈晓兰
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1

ISBN 978 - 7 - 80730 - 292 - 6

I. 诗... II. 陈... III. ①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②文艺学—文集③语言学—文集 IV. I0 - 53 H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6043 号

诗与思

——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录



编 者—— 陈晓兰

责任编辑—— 刘 娟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译文印刷厂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2.8 万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3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30 - 292 - 6 / I · 62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编 者 的 话

2005 年上海大学中文系申报上海市中国语言文学教育高地获得成功。

在中文系高地建设的一年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了国内外资深学者来校做了许多场精彩的演讲,这些演讲因每位学者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治学方法而精彩纷呈,深受师生欢迎。演讲内容涵盖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及语言学等各个领域,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小说史的重写问题、宗法思想与中国叙事艺术的关系、中华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学中公共观念的缺失及民间价值体系等等问题以及宫体诗、唐诗及古典小说的重新解读,在工业文明的大背景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考辨,出于对当代中国文化状况的忧思而对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现象的论述,立足于 90 年代中国文化的转型而对于文艺学学科的深刻反思,以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自然之维回应中国当前的现代化、都市化进程,对于西方文艺理论及哲学思想的译介,对于“西方”之概念的辨析,南北欧文学传统差异的勾勒,文学经典生成背后的政治文化机制,社会历史制约下的文学翻译对世界文学框架之形成的影响,以及关于都市文化及消费中的空间问题的讨论,对于当前网络文化的关注和跨艺术研究等等。传统学科中老话题的翻新,新问题的提出和全新的文本分析,现代前沿学科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阐发,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现象的热切关注,开拓了学生的思维视野,激发了学生的问题意识,深化了上海大学中文系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加强了本校教师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对国家、人类命运的关怀,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他们对于学术的那份虔诚和文化遗产的使命感,带给学生的则是对于非功利的文学专业的信心和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

关注。

为使这些学术观点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使这种学术精神发扬光大,我们特编辑此演讲录以飨读者。

由于篇幅所限,本演讲录无法将所有演讲尽收其中,敬请见谅。目前所收讲稿按演讲的时间顺序排列。

演讲录的编辑与出版得到王晓明教授、王鸿生教授、王光东教授、邵炳军教授、薛才德教授、吴惠娟教授的大力支持。曾军副教授、姚荣副教授做了部分联络工作和校对工作。研究生戴炜琚、丁黎晖做了部分录音整理。在此深表谢意!

本演讲录的出版得到上海市上海大学中文系中文教育高地项目的资助。

2006 年 8 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第一讲 宫体诗的当代批评及其政治背景	骆玉明 1
第二讲 唐诗新解	钟振振 11
第三讲 空间、消费与城市文化	包亚明 24
第四讲 重构一种陈述 ——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	金元浦 36
第五讲 利科的现象学的反思诠释学	高宣扬 51
第六讲 回归与超越 ——漫议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	刘跃进 65
第七讲 自然的自然主义阐释 ——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理论展开	韩经太 79
第八讲 李白生平及其诗歌畅谈	郁贤皓 85
第九讲 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	朱立元 102
第十讲 为什么是“五四”？为什么是《狂人日记》？	栾梅健 124

——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辨

第十一讲	重返 80 年代：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	张新颖	137
第十二讲	“文”、“文章”与“丽”	詹福瑞	155
第十三讲	双语和双语研究	瞿霭堂	170
第十四讲	唐代的白话诗派	项 楚	179
第十五讲	“小说史”的体例与重写	陈大康	189
第十六讲	欧洲南北文学传统的差异	王宏图	198
第十七讲	《大话西游》与跨艺术研究	严 锋	209
第十八讲	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	曾繁仁	218
第十九讲	从多元到单元的中华文化对民族性格的 影响	寒山碧(韩文甫)	235
第二十讲	自然之维	鲁枢元	248
	——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		
第二十一讲	宗法思想与中国叙事艺术特点	王先霭	258
第二十二讲	“金钱说了算”(Money Talks)	陆建德	270
	——从中国传统文学的某些方面看公共观念的缺失		
第二十三讲	鲁迅散文漫谈	钱理群	282

第二十四讲	伦理与政治·····	陈家琪	309
	——从《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说起		
第二十五讲	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	宋炳辉	323
第二十六讲	论译文之外的文化操纵·····	查明建	338

第一讲 宫体诗的当代批评 及其政治背景

骆玉明教授

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时间：2005年6月1日

地点：上海大学A楼603

演讲人简介

骆玉明，1951年7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辞海》编委，为其中中国古典文学分科主编。研究方向主要是汉魏六朝文学。主要著作有《纵放悲歌——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徐文长评传》、《南北朝文学》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三卷本等。并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台湾各种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

—

长期以来只是被简单地加以否定和指斥的宫体诗,近年开始受到比较认真的对待,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肯定,这反映出古典文学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所谓“宫体”,本来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似乎并没有完全被弄清楚,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譬如罗宗强先生在其新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分辨《梁书》与《隋书》有关记载的区别,提出:“所谓‘宫体’,它是一种讲求声律、对偶、与词采华美的轻艳丽靡的文风。”罗先生解释《梁书·简文帝纪》评萧纲诗“伤于轻艳”一语,也认为“‘轻艳’显系指文辞之特色而言”。大致按罗先生的看法,“宫体”虽然有多写女性体貌一类情况,但这个概念的出现,原来是指它在形式、技巧、文辞方面的特色;指宫体为一种以写闺阁生活为主要特征的诗,则是唐初史臣魏徵等为了“弘扬儒家之德政”而作出的至少是偏面的解释,它不符合“宫体”概念的本义。罗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前辈学者,但他在这里所作的辨析恐怕是有问题的。这其实不只是罗先生一个人的看法,由此我们感觉到“宫体”概念的本来含义值得推究。而尽管史料缺乏,但经过仔细追索,还是可以看到,在宫体诗兴起之初,就存在着一种当代人的批评;批评的出现,具有很实际的政治因素。而从政治需要出发批评宫体诗在道德意义上的不当,这种态度又不断为后人所沿袭——只是各人的立足点发生了变化而已。

二

我们先看《梁书》有关“宫体”名称之出现的记载。《徐摛传》记萧纲由晋安王入为皇太子后,原为晋安王府主要臣僚的徐摛“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即成为太子东宫的主事官员,然后说:

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

又《简文帝纪》说：

（帝）雅好题诗……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这两条记载都十分简略，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看出几个问题：第一，“宫体”的名称，是在那一种诗作开始兴起于太子宫中就出现的（“春坊”为太子宫的别称）。在后代看来，具有某种特征的诗被称为“××体”好像很平常，但到梁代为止，这种现象还不是很常见。而用太子东宫的“宫”为某一种诗之“体”命名，这是十分敏感而引人注目的——东宫乃下一代皇权的养育之地。第二，“宫体”的名称，显然不是宫体诗人们提出的。上引《简文帝纪》说“当时号曰‘宫体’”，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而上引《徐摛传》的内容，《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武帝中大通三年条的记载略有不同，谓“摛文体轻丽，春坊尽学之，时人谓之‘宫体’”。这里更明白地指出，“宫体”之名，出于不确定的“时人”。第三，提出这个名称，用意是不善的。一般说来，古代文人的品题多包含或隐或显的褒贬之意，有“宫体”之名，即自然引发“何为宫体”之问，引发对此疑问的解说。《简文帝纪》把萧纲之诗“伤于轻艳”，作为“宫体”之名出现的原因，可见此名中之义，绝非褒扬。——“轻艳”恐怕也不应仅仅作作为“文辞之特色”来理解；“轻”常有轻浮、轻薄之意，“艳”常指有关男女的内容。而《徐摛传》说“宫体”的名称起来后，梁武帝闻之发怒，把徐摛召去面责，更说明所谓“时人”在传称“宫体”之名的同时，伴随着对其非善意的甚至是攻讦性的解说。

尽管上引两条材料没有很明确地指出“宫体”之名是针对什么来说的（“轻艳”一词到底有些含糊），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材料来佐证。《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武帝太清三年条，载侯景上武帝启指斥其为政之失，言及“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这里将《诗经·卫风》中的《桑中》篇名作为淫放之诗的代称，指萧纲有关女性和男女之情的诗作，并进而证明萧纲的无德（其实以现存史籍记载来看，萧纲在“耽于酒色”方面并无突出表现，侯景启大抵是用诗来论断其为人吧）。依《梁书》、《南史》的有关记载，侯景的文书均出于其谋主王伟之手。王伟、侯景均生长于北方，太清元年才由魏投

梁。王伟想到拿萧纲的诗作为政治攻击的材料，必然是因为在梁朝社会中早已存在类似的批评；若向来人们并不关注萧纲诗多涉女性的问题，他也不用这么说了。所以，这正可以为《梁书·简文帝纪》谓萧纲诗因“伤于轻艳”而被称为“宫体”，作更落实的注脚。顺带说，侯景此启不载于《梁书》和《全梁文》，一般研究者似乎亦未加注意。但这实是宫体诗被视为淫邪之作的最早的直接材料；它出在侯景名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此外，《文苑英华》所存何之元《梁典总论》，也批评简文帝“文章妖艳，隳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意思和王伟所说差不多。《梁典》虽作于陈代，何之元却是在梁天监末即“宫体”之称出现很久以前就已入仕的（《陈书·何之元传》），所以这也应该视为当代人的批评。参照前面各条材料来看，这恐怕也不仅仅是何氏个人的意见，它代表着梁代以来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对萧纲诗的批评态度。

回头再看梁武帝闻“宫体”之名（自然包含着对它的解说）而发怒的事件。如果这本来只是（或主要）指它“讲究声律、对偶与词采华美”的文风，那么武帝的发怒、史家郑重其事的记载，便大可奇怪了。进一步说，即使“宫体”之名是就其多写女性体貌的特点而言，如果这只是诗歌写作范围的事情，武帝的表现仍然是显得过分的。日本著名学者兴膳宏先生在其《玉台新咏成书考》（董如龙、骆玉明中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说：“也许它那过度的淫丽刺激了老皇帝的神经了吧？”看来兴膳宏先生不觉得其中有何深意可究（文章的重点也不在这类地方）。但是，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武帝本人也写过涉于艳情的诗；说得更远，从魏晋以来，诗歌中关于女性和男女之情的内容就在不断增加，齐代沈约、谢朓诸人的所谓“艳诗”，在“褻慢”（刘克庄《后村诗话》所用评语）的程度上并不比宫体诗逊色；而且此风在梁代依然流行，如何逊的《咏舞妓》有“凝情眄堕珥，微睇托含辞。日暮留嘉客，相看爱此时”之句，也早有了宫体的气息（按何逊死于梁武帝天监十七年即公元518年，而萧纲至武帝中大通三年即公元531年方立为太子）。如果“宫体”名称的出现，只是说明徐摛、萧纲等人沿袭流行的风气写了一些艳情诗，武帝值得为此发怒吗？

三

这里其实有一个并非文学意义上的问题,即萧纲的身份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武帝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萧纲之兄、昭明太子萧统突然去世,至五月丙申,武帝诏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见《梁书·昭明太子传》及《简文帝纪》)。在这中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武帝在立嗣问题上曾反复犹豫。《南史·梁本纪下》记载,中大通三年,萧纲被征入朝,昭明太子谓左右曰:“我梦与晋安王对奕扰道,我以班剑授之,王还,当有此加乎?”这说明在萧统病重时,武帝征召萧纲入京,已有了让他继为皇太子的打算,而萧统也意识到这一点。然而萧统死后,武帝又召其子、时任南徐州刺史的萧欢入京,“欲立以为嗣”,至五月庚寅,复“遣还镇”(《资治通鉴》卷一五五),而确定以萧纲为嗣。其理由,武帝在诏书中说是因天下未安,择嗣须重贤德,故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梁书·简文帝纪》),按伯邑考为周文王长子,文王以次子姬发贤而越次立嗣,是为武王(见《史记·管蔡世家》)。依封建礼法,萧统死后,以“世嫡孙”萧欢为嗣,于义为顺;立萧纲为嗣,也属于“越次”之举,故武帝援周文王之例,说明这是一个必要的非常决定。但实际原因,却是萧统生前被人密告有所谓“厌祷”之事,为武帝所衔恨。“厌祷”一类事件,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引起宫廷巨变的导火线,萧统因此“终身惭愤,不能自明”(《资治通鉴》卷一五五,又《南史·梁武帝诸子传》)。他于31岁早夭,与此并非无关吧?立嗣乃封建王朝至大之事,牵涉高层政治人物的深远利益。武帝的越次立嗣之举,和在这过程中的反复犹豫,必定会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

但萧纲虽被确立为太子,他作为储君的合法性问题,并未就此了之。因为萧统久有仁德之名,所谓“厌祷”事件,又有诬告、夸大因素,他因此含恨早夭,引起许多人内心的不平。《梁书·昭明太子传》载:“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师男女,奔赴宫门,号泣满路。”这气氛是有点不寻常的。其子受他的冤屈事件牵连而失去皇权继承人的资格,更容易使许多人的不平心情变得愈发强烈。所以,尽管武帝为立萧纲为皇太子之事找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仍然是“朝野多以为不顺”,曾

为萧纲晋安王主簿的周弘正也特地奏记萧纲，劝他谦让(《资治通鉴》卷一五五)。《南史·梁武帝诸子传》更记载为：“帝既废嫡立庶，海内噂嗜。”甚至，直到侯景叛乱，在迫使简文帝退位时，还以他“次当支庶，宜归正嫡”为口实(《南史·梁本纪下》)。也就是说，萧纲作为储君的合法性问题，始终是可能引起攻击的。

如此来看所谓“宫体”名称的出现，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那背后的政治阴影。首先，萧纲和周围文人写作艳诗，并非始于太子宫中。尽管这一类诗的产生年代很难判别，但有些还是可以推断的。如萧纲《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这个“徐录事”就是徐摛，据《梁书》本传，在萧纲以晋安王、安北将军身份镇京口时，摛“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那首诗应为这一阶段所作。可见他们很早就在女性题材上进行唱和。但并没有因此出现诸如“晋安体”或“徐摛体”一类专门名称。而在萧纲为太子不久，带有政治攻讦意味的“宫体”一名马上就出现了。武帝诏立萧纲为太子，在中大通三年五月；正式策立，在同年七月。徐摛转为太子家令等职，当然是七月以后。接着有“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的事件。这到底在什么时候呢？据《梁书·徐摛传》，徐摛因“宫体事件”受到武帝面责，因应对得当，使之意释，之后还经历了一段“宠遇日隆”的时期，才因武帝宠臣朱异进言，出为新安太守，这也不过是中大通三年之事。我们假定徐摛出为新安太守是十一月底左右，此前他因在武帝面前应对得当而“宠遇日隆”的过程有一、两个月，那么，从萧纲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到“宫体事件”发生，不过是两、三个月间的事情，真是何其速也！

前面我们分析了“时人”立“宫体”之名是非善意的，其实际内涵，是指责这种诗多涉男女艳情，有违于君子之德，再来看这名称出现的时间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武帝的震怒，就容易理解了。——这绝不是一个纯粹文学范围里的事情。封建制度保证了帝王享有最充分的性供应，同时也要求他们保持不为酒色所溺的令名，能够成为国人的道德榜样。而萧纲作为一个刚刚册立的皇太子，又因为“越次”之故，引起“朝野多以为不顺”、“海内噂嗜”的舆论，竟由于作诗淫艳，而获得“宫体”的专用称号，岂非证明他不具储君应有之德吗？岂非证明武帝择嗣有误、其诏书褒扬萧纲之言不可信吗？这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难怪武

帝要把对皇太子负有辅导之责、又与“宫体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徐摛召入宫中严加申斥了。

徐摛与武帝对话的内容,以及他在这以后的遭遇,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其实那是很有意思的。《梁书·徐摛传》述武帝“召摛加让”,继言:

(摛)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

之后又记最受武帝宠任的朱异见徐摛出入两宫,心怀不忿,遂在武帝面前假言“摛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武帝信以为真,遂命徐摛出任新安太守。徐摛“应对明敏”之言,自是对“宫体事件”的辩解。但接着武帝又查考他有关“《五经》大义”等诸方面的问题,难道是无意味的吗?梁武帝是南朝特别重视儒教之作用的皇帝,《梁书》本纪记其所著有关儒学之书凡十二种二百余卷,据说“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同时,他也崇信佛教,这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不必多说了。受武帝的影 响,同时也是东晋以来南方社会的传统,在梁代,儒家经学、佛学,再加上史学,构成了上层人士最重要的具有严肃意义的学问,同时也被视为一个人立身的基盘。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武帝是否当着朝臣之面查考徐摛(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查考的内容和结果一定是被传播出去并要求郑重地加以记录的(否定今天就读不到上述记载了)。由武帝亲自在这些庄重的学问上查考徐摛并表示满意,甚至对其更加恩宠,不仅说明徐摛是有资格辅导太子的,更证明在太子宫中庄重的学问才是主要的,而所谓“宫体”的攻讦实是小题大做。

然而徐摛又很快被遣出京城了,《徐摛传》说是因为武帝上了朱异的当。梁武帝即使有时荒唐,但绝不愚蠢,他若在重臣的任用上如此容易上当,早就完蛋了。实际上,通过查考徐摛的学问并加以宠遇,是对“宫体事件”的反驳;要平息它却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知道揭出“宫体”称号的“时人”是些什么人,但其中无疑有高层政治人物。所以如果要维护太子,转移受攻击的对象,让徐摛为此付出代价是必要的;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各方面力量的平衡。至于朱异究竟是在整个“宫体事件”

中起了作用还是只在逐出徐摛的过程中给了梁武帝一个现成的借口，也无法弄清楚了，但萧纲对他一直是怀恨的。侯景叛乱时，萧纲作《围城赋》，痛斥朱异擅威权而祸国家，甚而以“豺狼”、“虺蜴”为喻，令朱异惭愤发病而死，谅非一日之怨。

《梁书·徐摛传》把徐摛从任太子官僚到出京的过程，作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来记载，其实可以看出所谓“宫体事件”实非小事。又，兴膳宏先生在《玉台新咏成书考》中注意到徐摛生前享有大名，然而《梁书》、《南史》直至《隋书·经籍志》均未著录他有文集，其作品早就亡佚殆尽，说这“真是个饶有兴味的千古之谜”。这话也说得很有意思。

这样来看唐刘肃《大唐新语》中的一段资料，会感到有趣：

梁简文为太子时，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命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

《大唐新语》年代已迟，所言不能尽信。譬如《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兴膳宏先生相当确凿地考定为中大通六年。那么，说萧纲晚年对其早期所作“艳诗”有追悔之意，才命徐陵编此书，就靠不住了。但通过编一本收集自古以来有关女性的诗歌的总集，将宫体置于这样一条文学长河里，“以大其体”，证明它是合理的存在，却有可能是萧纲真实的考虑。中大通六年，也就是徐摛、萧纲他们的诗被非善意地冠以“宫体”之称而加以攻讦的三年后，萧纲的政治地位应该是已经牢固了。编这样一部书，似乎很有一点坚持己见，并向反对派示威的意味。而徐陵正是因“宫体事件”遭到打击的徐摛的儿子，想来非出于偶然。

四

当然，萧纲他们的诗，还别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梁书·庾肩吾传》所说，从萧纲“在藩”到他为太子，他和周围一批文人（有庾肩吾、庾信父子，徐摛、徐陵父子等）所作之诗，沿着永明文士讲求四声的方向，“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即把永明声律又推进了一步——中国五言律诗的基本模式，就是在他们手中形成的。但是《梁书》作者

在这里并没有说上述现象与“宫体”名称的出现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注意到长期以来被习称为“宫体”的那些诗作有重声律的特点,却不应该含混地认为“宫体”一名的本来涵义与声律有关。梁以后人在评说宫体诗时,目光也很少放在其重声律的特点上,而是沿着梁代就有的政治性、道德性批评,并加以进一步的强调。如《隋书·文学传论》说: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经籍志》又谓: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闼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唐初史臣的这一类评论,立足点在于“弘扬儒家之德政”。为了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更密切地纠合起来,《隋书·文学传》批评的对象虽是宫体诗,但论梁代诗风之败坏,却不从“宫体”一名出现的中大通三年说起,而是说“大同之后”。因为史家一般认为梁代政治是始坏于大同年间的,盖被誉为贤相的徐勉死于大同六年,之后政归于有佞臣之目的朱异。至于萧纲他们的诗是否从“大同之后”写得更“淫放”了呢?论者原无意深究,只要那些诗恰好地担当了“亡国之音”的责任就行。这可以称为文学与政治的捆绑式嫁接。所以这样的材料不合适用来讨论宫体诗形成的年代问题。

大体到了唐初,“宫体诗”代表一种道德上邪恶、政治上有害的诗体,已经完全被确认下来。《新唐书·虞世南传》载:

帝(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